《台灣學誌》第 1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23-127
DOI: 10.6242/twnica.10.5

認識日本帝國的「台灣認識」：
評介松田京子《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
台湾原住民—》

*A Review of Japanese Imperial Ideology an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周俊宇

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學院區域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airboat@hotmail.com.tw

作者：松田京子
書名：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
出版者：有志舎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
ISBN：978-4903426839

近來日本的台灣史學界在台灣原住民研究上的成果豐碩，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多關注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對原住民造成的影響。這些作品不僅深具反省，論證鋪陳亦能周及原住民的主體性。本書作者松田京子教授便是其中一人。作者曾於 2003 年出版《帝国の視線——博覽会と異文化表象》一書，圍繞 1905 年日本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針對日本帝國脈絡下博覽會的意義和殖民地台灣的再現作了深入的討論。本書可以說是前一部作品的再延伸，收納的課題既有延續也有開創，將台灣置於日本帝國史脈絡下的論述角度，也有助於台灣史視野的開創。

本書設問基本上承接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從認識論的視角及「帝國」學知的觀點，考察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支配問題。帝國宗主日本與殖民地間，在中華帝國的遺構下雖具親和性，台灣原住民則無法歸納在內，並且由於絕對少數的人口劣勢，使得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間的矛盾，以及權力不均衡和直接、間接的暴力行使等問題，在收編或統治的過程中更尖銳地顯露出來。在上述問題意識下，本書主要側重在學問和文化面向上作探討，以下便依章節次序陳述各章大意，最後再就整體內容提出討論。

第一章〈戰爭報導中的台灣－台灣領有戰爭與台灣原住民－〉（章名皆為中譯，以下同）置焦點於日本入台武力征服時期的內地戰爭報導，討論這些報導怎麼再現甫成為殖民地的台灣？如何區隔漢人和原住民的形象？這些再現與日本國族主義間又存在哪些關聯性？本章後半集中討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薨去」，探討其死因、國葬、神化過程，對比存在於台灣各地、眾說紛紜的「北白川宮橫死說」，指出日台間歷史記憶存在歧異，使得日本方面形構的封閉性「同感共同體」時常面臨競爭與威脅。

第一次以原住民為對象實施的「內地」觀光，是第二章〈作為台灣原住民教化政策的「內地」觀光－以第一次「內地」觀光（一八九七年）為中心－〉的課題。台灣民主國瓦解後至 1902 年左右，日本統治持續遭遇漢人遊擊式的武裝抵抗，當時殖民政府為免腹背受敵，對原住民基本上採「綏撫」主義。內地觀光便在此一背景下實施。本章指出，不僅原住民和殖民地官僚在內地觀光上的意圖相背離，負責執行的官僚之間也存在分歧，原住民和內地民眾的交流更是極其有限。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歷史再現－關於伊能嘉矩的調查實踐與「台灣史」書寫－〉集中討論伊能嘉矩對於台灣的歷史書寫活動。作者援引「歷史的歷史化」概念，強調本章焦點不在探討其書寫是否真確，而在於伊能嘉矩透過歷史書寫意圖達成什麼？又達成了什麼？文中指出其書寫背後存在著社會進化論、生存競爭史觀等時代思潮，意在藉由批判往昔的中華文化將原住民和其生存空間視為「化外」，提供殖民統治將「文明化」正當化的一個認識框架。此一認識框架的建構，除了體現出伊能嘉矩對原住民「文明化」上投注的熱情外，也等於將原住民認定為生存競爭下的「敗者」。

第四章〈「帝國臣民」的外緣與「帝國」的學知－關於領台前期台灣原住民法學論述諸面向－〉、第五章〈由台灣原住民的法律地位看原住民政策的開展〉脈絡呼應。第四章談是否認定原住民為「帝國臣民」的「國籍問題」。第五章則從樟腦製造權、土地所有權等，具體探討原住民的法律處境。相關論述形成的時期，也是原住民統治政策由「綏撫」主義轉換到積極介入政策的時期。伴隨著武力的理蕃事業，便在以「否定」或「排除」為旨的思想支持下遂行。

第六章〈以「五年計畫理蕃事業」為名的暴力－作為「邊界線」的隘勇線－〉可說是本書前半部的總括，又接續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問題意識，重心置於探討「五年計畫理蕃事業」，以及支持這種直接暴力行使的「帝國的思考」為何？理蕃事業結束後，在「生活改善」等政策介入下，「蕃地」「內地化」的層面更深更廣。在此背景下，在台日人菁英間出現了保護原住民「原始藝術」的論述，而作者指出這樣的論述其實再度形構了「差異」。

「五年計畫理蕃事業」在台灣如火如荼展開時，同一時期在帝國核心舉辦的拓殖博覽會如何再現台灣？第七章〈人類的「展示」與殖民地再現—以一九一二年拓殖博覽會為中心—〉便透過相關考察討論其再現及其思考。博覽會是作者前一著作的主題，本章則指出拓殖博覽會更大規模地展示原住民，而且其展示技法不只在日本內地，也波及到殖民地的博覽會，甚至除了日常生活的展示，在 1930 年代台灣觀光事業的發展下，歌唱舞蹈的表演也成爲一項常規性的觀光資源。最後本章也提醒我們，真人展示在世界各地仍是觀覽少數民族的一種形式，並未消聲匿跡。

第八章〈一九三〇年代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統治實踐與再現戰略—「原始藝術」論述的展開—〉，指出 1930 年代「蕃地」內地化的統治實踐，是與鎮壓霧社事件這個直接暴力同時並持續展開的間接暴力。在這個兼具「日本化」和「近代化」雙重面向的暴力介入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殖民統治認定、區別出「應改善之陋習」和「可保護之文化」。原住民「原始藝術」的改善與保護，雖是在台內地人知識分子出於原住民文化即將滅失的危機感，進而呼籲促發的新動向，然而認定的行爲本身就伴隨著權力。並且，此一動向也能同其時日本帝國意識轉變、觀光事業資本等課題一併考察。

第九章〈台灣國立公園與台灣原住民—殖民地觀光事業的展開與原住民再現—〉考察了 1930 年代透過設置國立公園來保護、活用風景地的思考作為制度確立的意義，也關注日本內地的討論和制度在殖民地實踐的過程中歷經何種轉換？台灣原住民和這個動向的關聯又是如何？本章指出國立公園的設置在日本內地和在台灣的背景、意義迥然不同，而原住民作為人文風景，在內地化的加劇中，反而被賦予保存台灣特色的角色，進一步被捲入觀光資源中。

第十章〈「原始藝術」論述與台灣原住民—「初始」的敘述與殖民主義—〉主要討論台灣於 1930 年代出現的「原始藝術」知識建構，如何影響宗主國內部的言論空間？對於將原住民現存藝術與日本數千年前「原始藝術」相連結的論述方式，作者尖銳地評斷：不僅日、台兩地的空間性距離不被過問，原住民本身的「歷史性」也「不證自明」地遭到否定，意即時間性距離也被置之不理。

作者在終章總結時首先指出，回顧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原住民的歷史，籠罩著濃烈的人種主義的思考模式。同時也再度提醒，官定歷史的再現並非唯一，不僅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死因存在諸說，實施「五年計畫理蕃事業」的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死因，在部落中也傳承著不同的故事。這意味著象徵帝國意識的官定歷史和代表抵抗精神的民間或部落歷史間，存在著迥異的歷史記憶。文末，作者呼籲日本應該正視殖民地支配留下的暴力痕跡，以開啓不同歷史記憶間的回路。

現今台灣史學界對於日本統治時代雖已有深入審視，但這些成果未必充分地為社會普遍共享，戰後台灣語境下對於日本統治的評價，仍不時被簡化為「恩惠」或「收奪」等單純的見解。本書宗旨本在呼籲日本社會自省殖民地支配責任，而從台灣人的角度來閱讀，縱然所謂「帝國的認識」仍是偏重統治菁英或知識分子，但仍有助於吾人認識日本帝國的「台灣認識」，這也是本書的一大貢獻。

不同於作者前一部著作的主題單一、集中，本書企圖透過考察不同時期的歷史事件或課題，綜合性論述所謂的「帝國的思考」。這樣一種將個別論文系統性地集結成篇的成書架構固然多角度地呈現了主題面貌，但不能否認對於單一課題的考察只側重於某一時期，至於其他時期的演變則常有點到為止之嫌。例如，第一章指出台灣民間迥異於官定歷史的諸多「北白川宮橫死說」，其實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因的考證或故事，在台灣已有一些研究積累，而作者僅止於提出問題，未能同台灣先行研究進一步對話。再如第二章，作者強調原住民內地觀光經驗分析的重要性，也述及原住民的「內地」觀光至 1941 年為止共實施了 21 次，若能針對歷次觀光作更深入的發揮，或許更有助於吾人全面地了解內地觀光這個面向上究竟存在怎樣的「帝國的思考」。

本書各章時常可見試圖同台灣民間歷史記憶對話，或是從原住民角度來思考的字句段落，這當然顯示出作者對於原住民主體性的關照，惟本書的自我定位仍屬於台灣原住民統治政策史，因此作者遺留下的許多問題，不啻等同於給讀者的刺激，留待我們嘗試去解決、對話。

作者在序章便開宗明義指出原住民在日本統治下缺乏文字及媒體等自我表述工具的嚴峻狀況，認為透過書面文字來突顯其主體性面臨極大困難，另一方面卻也指出口述歷史作為分析材料，其方法尚須檢討而有所保留。然而，若要形塑原住民的主體性，在歷史文獻紀錄極少的現況下，口述歷史亦不失為一突破途徑。即便這樣的歷史敘述未必真確，卻也是一個摸索原住民如何「再現」自我歷史的絕佳方法。這是台灣學界的優勢，也是應當起而克服的課題。同時，我們也不該忽略，漢人對於原住民的介入或再現，其歷史遠較日本統治來得更長，更遑論它仍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關於戰後日本對「台灣領有戰爭」等殖民地支配責任的「忘卻」，終章將其歸因於日本的殖民地支配隨戰敗戛然終止，在國體與立國精神轉換至象徵天皇制和平主義的同時，天皇制曾和軍隊緊密相關的歷史也遭到「忘卻」。然而，我們或許不能忽略，這個「忘卻」也可以歸因到戰後東亞的國際政治情勢。同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相較，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東亞政治上的弱勢處境、台灣民間對比國民黨的失政而浮現的「親日情結」等等，使得對於殖民統治的反省和正義，在「台日友好」或「中日交惡」的修

辭氛圍下往往形同抹殺。如果日本對於殖民統治台灣的回顧審視，疏於她回應給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的歷史反省，這必然是戰後東亞局勢演變下釀成的一個結果，於是殖民地支配責任的「忘卻」問題，也就不單只是戰後日本的責任，也該是台灣社會必須平心自問的課題。